

知識危機與悲觀氛圍下的民主運動

許寶強 20160929

深入的時事評論真的愈來愈難寫，原因並不在於無話可說。相反，在這資訊氾濫的年代，每天總有新鮮事發生，我們也容易對這些剛發生的事情表達點想法。然而，正是由於新鮮資訊的生產周期愈來愈短，於急促變動的社會中書寫，總會出現仍未有很好地消化新信息前，就得下筆的壓力；另一方面，置身社會的兩極分化、時間與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的脈絡下，讀者也愈來愈不耐煩於仔細的閱讀，甚至傾向只追求簡化的立場和結論。

相對主義的知識危機

深度時評的書寫困難，反映的是一個更普遍的社會問題，也就是美國文化研究學者格羅斯堡（Lawrence Grossberg）所指的「知識危機」。他在新書 *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*（2015）中分析，在政治愈趨兩極分化的當代社會環境中，人們愈來愈失去了判斷客觀事實的基礎，從根本上否定真確無誤的知識的存在，甚至最終懷疑知識的價值和作用。

格羅斯堡不同意把當代社會的知識危機，全歸因於大眾和政客的愚昧無知，因為他觀察到，不少接受左中右不同政治立場的飽學之士，亦經常選擇性地接收或發放資訊，漠視與他們的政治立場或價值準則相異的「不方便證據」（inconvenient fact/evidence），出現了所謂的「亞馬遜效應」（the Amazon effect）——人們只接觸他們同意或願意接受的信息來源和知識。他也不同意資訊爆炸能完全解釋「知識危機」的出現，因為人們面對太多資訊而無所適從的情況，存在已久，但以往並沒有出現像今天一樣的對知識的質疑甚至貶抑；因此，問題不僅在於資訊的數量，更重要的是缺乏穩固的知識基礎，協助我們從眾多資訊來源中作出有根據的選擇。

格羅斯堡認為，「知識危機」的產生，除現代媒體的推波助瀾外，傳統上以守護和生產知識為任的大學，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他指出，媒體傾向把知識商品化，追求即食及易消化的語詞、聲音及影像，政治立場先行、各打五十式的「觀點平衡」，不僅不利於需要時間研究、分析、整理、閱讀和吸收的知識生產和傳播，更由於其對知識的簡化處理，例如把最極端的醜聞，當作為學院知識生產的常態，其不經意的後果，往往是令受眾習慣戴上政治立場和經濟利益先行的眼鏡，徹底質疑所有知識的可信性，為反智鳴鑼開道。另一方面，面對愈來愈嚴重的管理主義壓力的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，也參與了「知識危機」的建構，生產大量與民眾生活脫節的論文書籍；而不斷分化的知識派別，亦導致了公說公有理的混亂準則，無法建立能客觀判別知識好壞的權威。更重要的是，不論接受哪一種政治立場，學院的知識分子也傾向選擇性地接收和發放與他們立場相近的資訊

或知識。

悲觀主義的情感政治

與「知識危機」緊密相關，或可以說在背後支撐及強化「知識危機」的文化環境，是當代社會悲觀主義的氾濫。經歷了「689」和「831」的蹂躪，再加上最近的銅鑼灣書店和廉署「換馬」事件，港人大抵對悲觀主義的集體情緒不會陌生。格羅斯堡進一步分析，構成當代集體悲觀情緒的元素，包括了對現實社會的多元文化和社群差異的無感，取而代之的是愈來愈視任何事情都同等重要（或同等不重要）的犬儒態度；個人的決定或立場取向，不再建基於客觀的分析判斷，只純粹依據情感投注的強度作出抉擇，進一步強化帶很重相對主義味道的「知識危機」。

他又指出，當代的悲觀主義集體情緒，往往只容許兩種極端的情感政治選項：或是源自不容置疑的信念下產生的全知取態，或是植根於全然否定希望的犬儒退縮。這兩種情感狀態，不僅極端，而且還完全否定其對立項，希望滅之而後快。引伸出來的對政治實踐所產生的效果的判斷，是只容許全勝或全敗，也就是如果不能畢其功於一役，就會被視為失敗，毫不接受政治上的勝利往往並不會一蹴而及，也不重視階段性的勝利能逐步開展出新的可能性。結果是，這種悲觀主義的情感，經常「擁抱失敗」，並視「失敗」只是因為己方缺乏權力或敵人太壞太賤。

此外，構成當代悲觀主義的還包括一種無處不在、無始無終的焦慮感，這種視所有事情都處於危機狀態的焦慮感，往往伴隨着兩種極端甚至截然相反的情感表現：或是過度活躍的行動主義，或是抑鬱難動。而對焦慮的反彈或回應，則往往是暴烈地針對他人或社會的憤怒和報復，造成了當代愈演愈烈的日常生活中的暴力。對經歷了雨傘運動的港人來說，格羅斯堡的分析，是否也有點似曾相識？

傘運後的香港，不少民眾變得犬儒冷漠，對世界的前景不存希望，失卻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。如何超越和克服這種瀰漫於當代社會的悲觀主義情緒，走出「知識危機」，應是未來的民主運動的重要任務。而理解民眾的真實感覺或需求，細緻聆聽和分析他們的憤怒、驚恐、不安、焦慮、希祈與欲望，興許是任何以民為本的政治實踐的起點。

走出失敗主義的窠臼

當代「知識危機」和集體悲觀情緒的一種共同表現，是失敗主義的感觀和認知取態，也就是很容易全盤否定過去的努力，同時又看不見未來的希望。因此，要超越當代「知識危機」和集體悲觀主義，就必須尋找方法走出失敗主義的窠臼。嘗試認真而客觀地檢視歷史經驗，改變我們對過去的「失敗」的簡化判斷，並從中發掘各種有限的「階段性勝利」及其長遠後果，或許能有助我們告別悲觀、保留希望。

例如，回顧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，儘管革命者未能畢其功於一役，甚至很快出現了專制獨裁統治，但其提出的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博愛，卻成為了現代社

會的常識，影響深遠；又例如回到較近的香港，不少人都認為過去 30 多年的民主運動，包括雨傘運動，最終也一事無成，因而宣布必須以各種新的綱領，重新出發。然而，這判斷忘記了今天爭取民主的社會力量之所以能夠「重新出發」，實有賴於過去的民主運動所爭取到的「階段性勝利」成果的保障，包括 2003 年成功阻止 23 條立法，為迄今的公民抗爭保留了更大的空間；以至獲金像獎最佳電影的《十年》的「成功」，其實也建基於被描述為「失敗」的雨傘運動的「祝福」——體現於依據「命運自主」精神建立的「傘後」群體所組織的社區播映會，以至雨傘運動對演藝界的影響。

脫下失敗主義的短視眼鏡，以長遠的角度回顧民主運動的歷史經驗，我們或許能夠看到悲觀情感與「知識危機」以外的其他可能性。

參考書目及延伸閱讀：

Grossberg, Lawrence (2015), 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: The Paradox of the U.S. Left (A Polemic)

(www.academia.edu/13048909/We_all_want_to_change_the_world_The_paradox_of_the_U.S._left_A_polemic)

(原載明報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九日)